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新天主之名當中

天主之名當中



益揚乾坤明教

天主實

錄正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及书目补编

[法] 荣振华 著 耿昇 译

天主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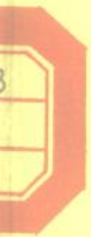
天主堂行

天主堂行

天主堂行

天主堂行

天主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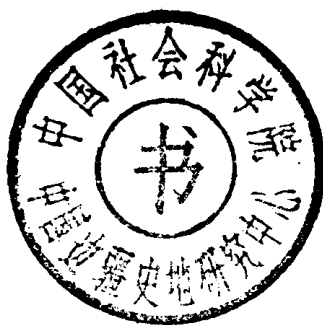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在华耶稣会士
列传及书目补编

上册

[法]荣振华著
耿昇译



中华书局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在华耶稣会士
列传及书目补编
下 册

[法]荣振华著
耿昇译



中华书局

R 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1800

JOSEPH DEHERGNE, S.J.
INSTITUTUM HISTORICUM
LETOUZEY & ANÉ
ROMA PARIS

1973

2129/60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全二册)

〔法〕荣振华 著

耿昇 译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34¹/₄印张·3插页·708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定价：36.00元

ISBN 7—101—01036—9/K·421

译者的话

16—17世纪，为中国明末清初之际，这时正是欧洲殖民列强迅速扩张的时代，各殖民国家疯狂地开辟和争夺海外市场，残酷地掠夺和剥削非洲、美洲各落后国家和地区，他们的魔爪也伸向了印度、中国和远东其它地方。他们一方面实行“炮舰政策”，直接出兵侵占掠夺各落后国家的领土和人民；同时又用软的一手在思想形态方面实行渗透，“传教”或“福音化”就成了他们的一种伎俩和手段。基督、天主教各修会的海外传教士也就应运而生了。

明末清初，西欧各国和天主教会向中国大量派遣传教士主要是从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çois Xavier)于1552年底(明嘉靖年间)到达广东上川岛开始的(他于同年12月2日死于那里)。从此之后，传教士们便陆续到达中国。其中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此外还有少量的英国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人、荷兰人、奥地利人、立陶宛人和比利时人等。他们中间有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遣使会会士、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此外还有罗马教廷传信部、冉森派和嘉布遣派的教士等等。其势力在清康熙——乾隆年间达到了最高峰。

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耶稣会是1534年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ce de Loyola)创建于巴黎的。

1540年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1773年被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取缔,1814年底护七世教皇又予以恢复。该会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人数很多,势力也很大。他们赴华都身兼传教和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的双重职责。法国科学院的弗雷烈(Nicolas Fréret)和内阁大臣贝尔坦(Bertin)经常寄给他们调查提纲并与他们保持频繁的通讯关系。由于这批会士渗透进了中国高级官吏队伍,甚至出入于皇宫深苑和生活在皇帝身旁,又从事了大量的科学和学术工作,所以其影响也最大。

耶稣会士是由殖民列强、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派往中国进行传教,推销精神鸦片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在华的主要活动是布教和力图使中国受归化。但是,他们在中国也从事许多文化方面的工作,为中外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成绩。他们把欧洲的一些科学技术书籍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在中国从事大量的天文观察和地图测绘,在美术、数学、建筑术、文学、医学、史学、语言音韵学诸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又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向西方作了介绍,中国的许多工艺和农艺也传入欧洲。当时在法国先后出版的三大部中国学奠基性著作《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杂纂》都是在华耶稣会士们搜集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或以他们的资料为素材而编纂的著作。由此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强烈的“中国热”浪潮。

在华耶稣会士们长期生活在中国,与中国各界人士都有密切接触。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都怀有友好感情。他们用汉文和西文著书立说,或向欧洲的上级及朋友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信。他们的著作成了外

国最早的中国学论著,因而他们也是最早的外国中国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延续至今的国外中国学的创始人或奠基人。耶稣会士与基督教其他修会的会士们相比较人数最多,文化程度最高。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来华之前就是颇有名气的学者,入华后又从事中国学研究。耶稣会士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宫廷任官,甚至还出任中国皇帝的西学老师。有些耶稣会士还曾作为中国皇帝的特使出使外国国王(如法国国王),沟通了中国皇帝与外国国王之间的联系,这与派遣中国官吏们出使的作用不大相同。所以,他们在明末清初的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他们既生活于北京和宫廷中,又分散在中国广大城乡,所以他们搜集了一大批有关中国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内政外交、社会经济、军事战争、科学技术、名人轶事、宫中秘闻、皇帝起居、重臣辅政等各方面的资料,而这一切又大都不见诸中国载籍。所以,这些情报今天便成了研究明清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原是对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1889年)的《原中国传教区的耶稣会士传记和书目提要》(2卷本, 1932年和1934年上海版。冯承钧先生译作《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似不大妥。因为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人,尤其是澳门人。该书名依方豪意见,应作《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的补充,同时也纠正了费赖之书中的一些错误,因为费赖之当时在上海写书,无法充分利用收藏在欧洲丰富的有关档案,而且自该著问世60年来,又有了新的发现和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费赖之书首版于1932年,当时费氏辞世已有44年了)。本书是费赖之书的重要修正与补充,故本书译名改为《在华耶

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有关入华耶稣会士的传记资料基本就比较齐全了。

本书第1章在《列传》部分共含920个号、975位耶稣会士的传略(有的号中带有1—3个副号);第2章和第3章是有关中国传教区耶稣会士们的各种统计资料,其内容非常丰富,都是原始资料。本书原法文版于1973年由罗马耶稣会历史研究所与巴黎勒图齐(Letouzey)和阿内(Ané)书店出版,作为《耶稣会历史研究所丛书》第37卷刊行。当时正值中国10年动乱期间。我们知道国外出版了这样一部重要著作,但北京的几家主要图书馆均未收藏。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法国国立研究中心敦煌文献研究组原主任苏远鸣(Michel Soy-mié)先生和华裔法籍中国学家侯锦郎博士把他们个人收藏的一本书寄给了译者,以供翻译使用。特此向法国朋友表示感谢。

本书对使用的每一条资料都交待了它的原始档案和后人著作的出处。卷首列有345条详细的参考书目。为了不使译文篇幅过分冗长,我们对所有参考书目均编了号,然后再加上卷数和页数。如1/20即指第1条书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巴黎1929年版),第20页;276/20/154即指第276条书目(《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1706年版),第20卷,第154页,等等,依次类推。书末原附内容索引和耶稣会人名索引,我们只保留了价值较大的后者。

入华的耶稣会士们一般均有汉名。但除那些曾在中国宫廷生活过和曾著书立说者(尤其是以汉文写书者)之外,其他会士的汉名则不很容易查到。所以,我们完全尊重原作者的

观点，对于作者不知其汉名的那些外国耶稣会士的名字一律采取音译的办法，不再仿造汉名（但有时也沿用了冯承钧先生在《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仿造的作法），将名字的原文放在括号内。音译名字仅供参考，使用时应以原名为准。

本书是我于1983年上半年译好的，1986年下半年到法国顺便参加了第5届尚蒂伊国际讨论会，在此期间，我与本书的作者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 J., 1903—1990年）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5天。当时的荣振华教授虽然已经83岁高龄，但看起来却很健康。他身材魁梧，善于言辞，待人温厚，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当时与他谈到他的《中国的犹太人》一书已译好交给了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同时还翻译了他的《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一书并交给了中华书局。当时可能太乐观了，认为这两部译著很快就会问世。我们相约，在他的这两部书于中国出版时，他一定会再次来中国大陆旧地重游。他在言谈话语中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感情，始终不忘他1936—1951年间在中国上海与北京度过的美好时光。荣振华对中国文化更是酷爱不已，他从1936年之后的50多年间的全部心血都洒在研究中国文化的事业上。他虽然是一名传教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种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下，他不可能不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大棋盘上的一颗卒子；但是，从我们对荣振华教授全部著作的回顾来看，他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文化研究，成了国际上一名颇具名望的大汉学家。他的学术观点一般来说都比较公正客观，尚未见有诽谤中国人民的言行。他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行为有过批评，对于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过许

多不解或误解之处。他 1964 年曾为中法建交而热烈欢呼,也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拍手叫好。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对欧洲有过很大影响。

1985 年, 我就《中国的犹太人》和《1552—1800 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两书译成中文并准备在中国出版的消息通报了作者。荣振华先生听到后非常高兴, 不顾 80 多岁的高龄而连续写了数封信以改正其书中的疏忽之处和印刷错误, 同时又分别为这两部书的中译本写了序言。但由于种种原因, 它们均未能及时问世。现在, 中华书局和中州古籍出版社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使这两本书都付梓, 我心中感到极大幸慰。但不幸的是, 荣振华教授已逝世一年多了。

荣振华教授于 1903 年 3 月 10 日生于法国的旺代 (Vendée)。他是这个家庭 10 个孩子中最年轻的一个。他自幼就渴望成为传教士。1921 年, 他进入设在旺代的初学院。在此 3 年之后, 他应征入伍服兵役 10 个月, 接着于 1925 年 6 月 20 日成为巴黎教省的耶稣会士。他按照正常的教规而于 1925—1927 年经过初修, 于 1927—1929 年在拉瓦尔学习文学, 1929—1931 年在泽西岛学习哲学, 1931—1933 年在巴黎的中学中实习, 1933—1934 年在里昂学习神学。1934 年 8 月 15 日在蒙特玛尔圣彼埃教堂晋升为神父, 从而开始走上了他终生从事宗教和文化事业的道路。

荣振华神父于 1936 年出发赴中国传教区, 与 3 名耶稣会士同行。经过 1 年学习中文之后, 他便开始向初修耶稣会士讲授教会史, 1938 年在当时设于上海的教会大学复旦大学讲授历史和法文课。从此之后, 在他于中国长达 15 年的生活和

工作期间,作了许多科研工作,著述甚丰,尤以对16—18世纪的传教史的广泛研究成绩斐然。在他于1946年出任《复旦大学学报》的秘书之后,在该刊中发表了许多论文并为两部书作了补遗。

荣振华于1951年离开中国后到达了法国巴黎郊区的尚蒂伊,先后任该处图书馆馆长和法国教省的耶稣会档案馆的档案员。在此之后的40年间,他继续从事中国学研究,先后在罗马、马德里、里斯本和伦敦搜寻有关中国传教区的文献资料。他于1959年获得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经济和社会学系的毕业文凭,发表了《大革命前夕的下普瓦图》的论文。1964年,他通过了国家3级博士论文:《贝尔坦的两名中国人,1764年的工业调查和法中技术合作的开端》。1965年,他在谢和耐教授的指导下发表了有关18世纪中国瓷器和丝绸交流的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1982年,荣振华主持在我国台北召开的東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外,他还参加了在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召开的纪念利玛竇入华传教4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他从此之后轮番在故乡旺代、尚蒂伊、罗马和梵蒂冈从事有关16—18世纪中国耶稣会传教区的研究。他未能杀青的遗作是继《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之后又编写的一部《1842年之后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他曾与原入华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Maître)一起倡议并主持了3届国际汉学讨论会。荣振华于1974、1980、1983年又先后主持了3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并主持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从1986年的第5届起,他又邀请

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长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共同主持这种每隔3年举行一次的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其范围始终是18世纪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这几次学术讨论会及其论文大大地推动了欧洲及全世界的汉学研究,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研究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潮。据马爱德声称,这种学术讨论会今后依旧如期在尚蒂伊召开。从现在已发表的论文来看,论文的观点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尤以有关东学西渐或18世纪中国对欧洲影响的论文引人注目。译者有幸于1986年参加了第5届讨论会并已翻译介绍了其中的许多篇论文。

荣振华于1990年6月下旬在南特附近的图阿雷去世,享年87岁。但他33岁到48岁之间最宝贵的年华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中挂了许多中国画与条幅,他的几枚汉名印鉴(荣振华)始终保存在其案头。他一生中积累了大批中国学的书籍。荣振华的中国文化遗产是很丰厚的。他使尚蒂伊成了法国一个重要的汉学中心。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我于此谨向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陈增辉先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黄丙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焕生先生表示衷心感谢,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难题。中华书局负责中外关系史的编辑同志也对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修改了许多纰漏,特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实在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耿昇 1991年国庆节,北京

中译本序

如同中国人一样，我也非常热爱我的祖国并衷心祝愿她繁荣昌盛。我可能更加喜欢自己出生的故乡——旺代 (Vendée)。我当时恰恰完成一部有关在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农民的反抗、英雄行为和遭灭绝种族大屠杀的著作。他们的牺牲不会是无意义的。正如波拿巴(后来的拿破仑一世)所承认的那样，他们使其国家的历史倒退了。这些被解除武装的农民使她获得了一种深刻信仰的自由，这种自由在下一个世纪中又由于一种宽厚的传教精神而得到了充分发展。我当时正好 33 岁。当我的省会长于 1936 年派遣我和另外两名耶稣会士共同赴上海时，该书的手稿以及所附的由一位著名的地图学家传教士制作的大量地图都已完成了。

我是怎样获得出发前往中国的幸运呢？下面就是这件事所发生的背景：1935 年，法国耶稣会教省（巴黎）发表了一项公报，提出征募可以作为传教士而前往中国工作的志愿人员。我们那些在中国负责江苏和上海两大省的神父们由于一所重要大学——中国唯一的一所法文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像上海学院那样的神学院的事务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省会长的公报，我们应提一下下述事实：当时在委托给巴黎省耶稣会士们的上海传教区共有 4 个宗座代牧的职位（它们后来都变成了教区），即上海、海门、苏州和

南京的宗座代牧。那里共有 234 名耶稣会士，其中包括 118 名神父（19 名中国人）、60 名学生（9 名中国人）、36 名助理修士（14 名中国人）和 20 名中国初学修士（其中 10 名是助理修士）。他们都由辅助人员帮助，其中有 23 名撒勒爵会士、68 名玛利亚的小兄弟会会士，10 名特里夫斯的仁爱会的神父。该教区的神职人员由 7 名中国神父组成，在大神学院里有 59 名学生，在小神学院中有 19 名中国人。在 713 名女修道士中，有 435 名中国女子，尤其是加尔默罗会修女、涤罪所的女助理、保禄的圣·樊尚之修女，233 名为中国圣母献堂瞻礼士、医院、门诊所、学校、传道士（121 名中国男子，65 名中国女子），一座韩伯录博物馆，一座观象台。该观象台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台长是彼埃·勒热（Pierre Lejay, 1898—1958 年）神父，他后来被选为国际无线电技术科学联合会主席（1952—1957 年）和国际重力测定局局长（1955 年）。

耶稣会会长已表示同意，我们 4 人在马赛登船前往上海，于 1936 年 10 月抵达那里。当时，我们的传教士们已不再返回法国了，除非是在身体健康受到了损害的例外情况下。我当时非常乐意死后也在这个伟大而又崇高的国家中埋葬于我的耶稣会士教友们身旁，我希望能在那里长期工作。

我在那里干什么工作呢？在我有幸于中国生活的 15 年间，我首先用了两年先后在上海和安庆学习中文。在此期间，我在徐家汇印刷厂完成了一部叫作《旺代人（1793 年），大军、地区生活》的著作出版工作（上海 1939 年版，现已绝版的著作）。1938 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徐家汇的神学院向未来的神父们讲授历史。1939 年，我在徐家汇耶稣会士住院中当

司书。从此以后，我每个星期日都去作弥撒并在上海东城的一个教区布道。1940—1946年间，我在复旦大学讲授法文和通史。1947—1950年，我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法文教授、作家、图书馆管理员和《复旦大学学报》的发行人。1951年，我返回了法国，又重新任尚蒂伊哲学院的图书馆员，于1953年成为耶稣会法国省(巴黎)的档案保管员。我作为巴黎高等研究学院的历史系学生，于1963年在巴黎出版了《大革命前夕的下普瓦图》(Bas-Poitou=旺代，已绝版的著作)，收入了《大革命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史委员会的论著与资料丛书》第16卷。我后来于1970年帮助勒内·西蒙(Renée Simon)夫人发表《宋君荣神父北京书简集(1722—1759年)》，日内瓦德罗兹书店1970年版(共1001页，342封作了注释的书简，第884—910页是宋君荣神父的著作目录)。1980年，我利用我们教省档案中的丰富资料而发表了《18世纪末刊布的耶稣书简中记载的中国犹太人》一书，它是由我与在这一问题上的大专家——澳大利亚的莱斯利(Donald D. Leslie)教授合作写成的(罗马—巴黎1980年初版，1984年第2版)。

对于1800年之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问题，大家可以列举我的以下著作。《传教士们对中国地理的研究》，1953—1976年逐省地研究，载《耶稣会档案》杂志的各卷中(1953年第22卷，1953年第24卷，1959年第28卷，1961年第30卷，1967年第36卷，1973年第42卷和1976年第45卷)，从北京、蒲州、蒙古一直论述到中国南疆诸省。我于1980年发表了一份书目，叫作《明代中国耶稣会士传教区的年度报告》(同上杂志，第49卷)。我先后在圣言会的刊物《华裔学志》中发表了

一、史料来源、主要资料及用法

时至今日,为了研究原耶稣会的传教士,我们只掌握有现今已绝版和无可替代的一部著作,即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神父的《原中国传教区耶稣会士的书目和传记提要》(冯承钧先生将该书译作《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其中的一些耶稣会士是中国人,不是入华的外国人。——译者),作为《汉学论丛》第59和60卷,于1932和1934年在上海以两卷本出版,该书曾由孔神父(Joseph de Lappavent, 1862—1953年)^①精心地校订,又由同一位学者补充和发表于《徐家汇汉学研究室情报》(313)中。但他当时未能直接接触非常丰富的欧洲档案,另外,他在研究中表现得很谨慎,特别在阐述中受到在1907—1939年期间有效的罗马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决定的限制。但是,这部著作仍是对我们的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和著作作出任何认真严肃调查的出发点。

如果参阅下列一些人的著作的话,那末始终都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不可缺的: C·佐默尔沃热尔(Sommervogel, Carlos):《耶稣会丛书》以及由里维埃(Rivière)所作的补编;

^① 科罗斯·雷普林特(Kraus Reprint, Nendeln, Liechtenstein)重版了此书,从而为史学家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法国目录,法文著作,1972年版)。

80岁了),我希望能够继续写本书的第2卷:《1842—195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842年是他们到达北京的时间)。

我们对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先生翻译西方史学家们的著作表示衷心的高兴与热烈的祝贺。耿昇先生还翻译了我的另外一部著作《中国的犹太人》。我对他辛勤的劳动和友好的行为表示钦佩。对于中国人由此而表现对于搜集和用自己的语言介绍那些曾在他们那伟大民族的历史上工作过短暂时期的所有人之论著的兴趣,我于此深表感谢。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朋友能读到这本书。

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耶稣会士和1965年巴黎大学史学博士

1985年10月于法国尚蒂伊